

当前跨文化研究的重点与要点^[1]

——“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

董晓萍

“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自2015年9月7日至10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中、欧著名学者九人组成讲演团，面向选修跨学科方法论平台课的博士研究生开课。法国现代汉学泰斗汪德迈教授（Professor Leon Vandermeersch）教授和法国新一代汉学家金丝燕教授组团授课。我国跨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乐黛云先生首席演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三大传统文科——民俗学、语言文字学和古典文献学专业组成最强阵容联合演讲。北京大学中印文化史研究专家王邦维教授加盟讲座。多年来，中外已有诸多高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法国里昂大学和阿尔德瓦大学等校开展了跨文化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积累。本次讲座实现重点转向，以乐黛云教授和汪德迈教授为首席，在北京师范大学起步，创立中国的跨文化学新学科。

9月7日，讲座开幕式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学术会堂隆重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指出，当今世界极为关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才教育的走势，呼吁文化多样性，同时也希望从中国崛起中获得对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启示，这些理解和交流工作都要通过跨文化对话完成。中国的历史文明世界知名，法国汉学影响很大，但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积极对话，如何将这些现代研究成果投入教育实践，转化为大学课程，激励各国年轻一代为延续人类优秀文明而携手奋

[1] 本研究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SKZZB2015026。

斗，这是我们双方高等教育工作者都要思考的大问题。文化保护是人类的权利，文化教育是人类拥有美好未来的基石，跨文化方法论建设是人类的文化自觉和多元化教育走向纵深的标志，北京师范大学愿意为这样一个中、欧跨文化研究平台提供持续的支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和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章黄学派的重要传人王宁先生、文学院分党委书记王立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李国英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董晓萍教授先后致辞，一致认为，高校同行已取得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成绩，继续在该领域增加传统国学、民俗学和古典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加固这门学问的根基，并为跨文化学科建设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框架。

本次讲座由乐黛云教授和汪德迈教授担任首席双讲，共 21 讲，60 学时。全部参加讲座的中、欧学者的题目分别是：[法]汪德迈《导言：汉学研究方法要点》《第一讲 用中国文化特色认清中国文化道理》《第二讲 依靠汉学文言考古学划分古代史分期》《第三讲 用整体观点考察中国思想的特殊性》《第四讲 特别考察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礼治》；乐黛云：《第一讲 多元文化发展与跨文化对话》《第二讲 跨文化对话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法]金丝燕《导论：跨文化研究与文化转移的定义》《第一讲 佛经汉译：早期中国的文化接受》《第二讲 中国文学西渡》《第三讲 中国新诗源：初期象征派的接受视野》《第四讲 当代中国的文化转移平台：〈跨文化对话〉杂志》；王宁：《关于汉字性质与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程正民：《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跨文化研究》；王邦维：《第一讲 书写“异域”：古代中国的印度想象与经验》《第二讲 “边地”还是“中国”：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优越感问题》；李国英：《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董晓萍：《第一讲 跨文化民间文学研究的遗产、方法与个案》《第二讲 跨文化民俗学研究的体裁与民俗志》；[爱沙尼亚]于鲁·瓦尔克：《第一讲 爱沙尼亚传说中的社会现实建构》《第二讲 欧洲魔法故事研究》《第三讲 民俗中的人兽互变与人类学中的本体论转移问题》等。

本次讲座的要点之一，是对处于中西坐标上的跨文化方法论研究的学术史及其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乐黛云教授在讲座中指出，自 20 世纪初以来，我国已形成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史。王国维是屹立于古今中西坐标之上的重要人物，他汇通古今中西，提出所有文化在交流碰触之后都有改变，会产生互振、互识和互看，要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鲁迅与王国维不同，鲁迅更强调民族精神，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外视野也更为开阔。乐教授还提出，在现代社会开展跨文化研究，要面对新的问题，至少要注意四点：（1）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悖论。普遍的观念才有可能相互理解相互合

作，但普遍却不能威胁到特殊性的存在，要承认个别中的一般和一般中的个别。(2) 保持纯粹和相互影响的悖论。文化之间要相互了解相互促进才能够取得进步。但在现今世界背景之下，一元化的趋势逐渐明显，这有科技发展的作用，也有文化霸权的影响。如果没有对话，就很难制止一元化的进程，很难终止霸权的存在。(3) 自我与他者的问题。跨文化对话中不要求一方服从另一方的想法，也并非完全的融合，而是让文化在自己的轨道上进行自我发展，产生多元性。这种关系是面对面的，双方都能直视其差异，这是跨文化的重要原则。(4) 差异与间距的问题。差异来源于间距，因为自我与他者有着距离，两者就会产生不同。对差异来说，是将文化进行了某种分类。而距离则无视这种分类，只是进行一种单纯的比较，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无到有的讨论，在这里就会产生新的思想。我们应当研究思想的分异之处。乐教授近三十年来在现代文学领域开创了国内的比较文学专业，再转向跨文化学科建设，眼光阔深，成果丰厚，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兼通的优秀人才，搭起了中外跨文化对话的桥梁，也向世界发出了中国文化自信与自强的声音，其人格与学术魅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听讲者。

对“跨文化”概念的界定是推进跨文化研究的必要前提。金丝燕教授对此做了多年的探索，发表了很多研究文章。她提出：“跨文化的含义有三点：一是探讨跨文化性的概念，提供文化个体或文化群体的放眼能力，这成为一条通往文化自觉的道路；二是跨文化研究提出主流文化与被主流文化所控制的或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问题；三是揭示文化冲突各方的接触点，探讨各文化间的可能的联系、对抗、相关性、交流和互动。”对“跨文化”的词义，中西方理解不同，我国国内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解，金教授界定的“跨文化”的概念，与她本次讲授的系列课程相配套，集中西学者之思，视角中和，体现对话的特点，又有精彩独到的见解，得到中法学者的一致认同。

汪德迈教授在讲座中强调自己是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出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热爱。他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学说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思考，另有一番大学者气象。他指出，在跨文化方法论的研究上，他赞同汤一介先生的观点，应该用中国的材料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学者不应该模仿西方人的表音和表意语言系统研究去构建中国文化研究框架。要知道，西方人不重视文字是不对的。中国文化中的汉字对形成中国文化特征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正是在汉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整体性的关联性思维，这种思维帮助中国人在家族制演进的过程中摆脱了宗教学，创造了礼理文明。这与西方的权力文明有很大的差别。在礼理文

明作为思想体系的支配下，中国古代生产方式为封建集权下的井田制。在战国时期，法家废除礼理，建立了土地私有制。汉朝又恢复了礼理文明，同时也因袭了前代的土地私有制，但中国的土地私有并未完成。中国的礼理规则正是在这种未完成的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尚未进入封建帝国官僚体制，仅限于商人习俗，故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但始终未能制度化。汪德迈教授的讲座以其丰赡的史料、严密的分析逻辑和深刻的学说体系带给听讲师生强烈的震撼。

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座期间，还应北京大学哲学系之邀，汪德迈教授还前往北大，为首届“一介学术讲座”进行了首场国际学者讲演，他深刻地阐释了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贡献，认为汤先生总编纂《儒藏》工程如同孔子编五经一样重要，应在世界现代汉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精彩演讲引起与会百余位中国学者的热烈反响。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中国传统国学与西方学说的撞击中，还是在西方汉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中，儒家礼仪道德文化始终处于中西跨文化研究的核心位置。王宁教授就此与汪德迈先生展开了对话。她提出，“‘礼’是体制与行为、思想的总称，‘礼仪’是在体制需要的前提下思想的外化行为。体制在国家层面，礼仪在个人层面。《周礼》讲官制、体制，在国家层面。《仪礼》讲行为规范，在个人层面，但也是为了维护国家体制而设定的。两者都是思想的体现，不是机械动作。《礼记》偏重讲思想和理念。有继承价值的是礼学中反映出的思想和理念。因为其中一部分带有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普遍意义。礼仪文化中优秀的思想传统可总结为八点：崇尚天然，追求人和，以民为本，亲仁善教，修身自律，权变致用，贴近生活，精益求精。现代礼制既要批判地继承，又要与法律的完善同步，重新建构”。汪德迈教授发表积极回应，对王宁教授的研究观点予以高度评价。

在跨文化方法论的研究中，要解决民族自我文化优越感的问题。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指出，很多民族曾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在心理和文化上都有一种优越感。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有过，在印度也有过。但在他人面前自认为优越，是人性的一部分吗？这种优越感会影响到文化的交流吗？对这些问题也应该讨论。

跨文化方法论研究以提倡文化多样性为基本议题，必然涉及民俗学的研究。民俗学参与跨文化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我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积累了多民族乐于接受和相互适应的内部跨文化模式，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民俗学者在这方面提供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这还不

够，还要扩大研究空间，开展跨文化方法论框架下的民俗学研究，目前应抓紧思考的问题有三：一是总结具有人类共享潜质的神话学和故事学研究方法，反思类型学研究，提供人类文化共享新资料，同时也要强调对最具人类文化差异的语言、风俗习惯、国民生活模式和社会心理的关注，加强多元文化研究，找到抵制全球化和一元化的直接途径；二是调整民俗学的现代定位，在封闭或半封闭社会中，民俗的教育功能是惊人的；但在开放社会，民俗的教育功能减弱，本体论与认识论分离，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增强，这适合做跨文化研究；三是跨文化方法论提出的方法是成套的，其中有关历史文明、语言、文献、考古、风俗、特质、一元、多元、差异等一系列概念，富含温厚的和平精神，提倡人文价值观，强调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尤其值得关注。

为时近一个月的讲座引起热烈反响，来自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艺术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对外汉语和国际汉语教育等14个专业的研究生和教师慕名来聆听这场跨文化的盛宴。中、欧学者的精彩演讲吸引了众多跨专业、跨学院、跨学校甚至是跨年龄、跨性别的研究生与教师，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年轻的外籍人士，大家有的倚门而立，也有的席地而坐，场面可谓火爆。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和中国广播网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本次讲座陆续进行了报道。